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台灣移民現象的後殖民論述

The Immigration Phenomenon in Taiwan-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stcolonialism

doi:10.29960/SIC.200706.0003

國際文化研究, 3(1), 2007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Culture, 3(1), 2007

作者/Author：葉郁菁(Yu-Ching Yeh)

頁數/Page：55-7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7/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960/SIC.200706.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台灣移民現象的後殖民論述

## The Immigration Phenomenon in Taiwan –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stcolonialism

葉 郁 菁\*

YEH Yu-c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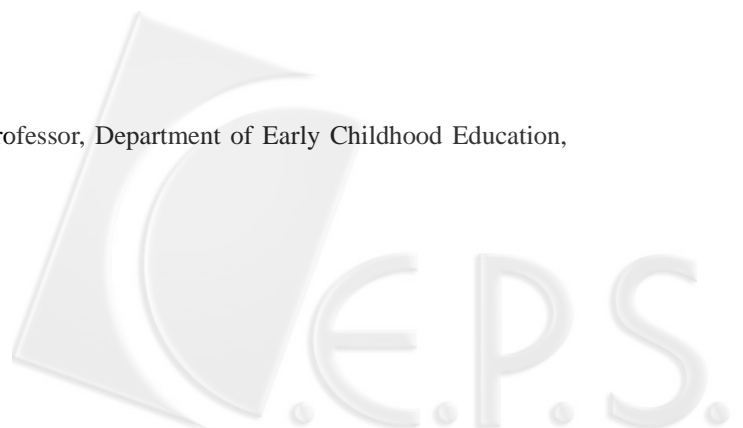
### 摘 要

本文從 Fanon 與 Spivak 的後殖民主義理論探討台灣的外籍配偶現象，並從對移民者偏見的社會共構、自我的內部殖民、語言的學習—臣屬於宗主的「失語」狀態、後殖民論述中的女性主義批判四個主題進行。

近年來東南亞與中國移入的人數（尤其是女性）增多，開始出現許多對外籍配偶現象的研究與探討，但研究者認為，移民現象的探討不應只是數據和文字的描述，必須從回歸到後殖民論述重新檢視台灣的移民現象。為了強化內部的社會整合發展出獨尊主流社會文化的「內部殖民」論調，充分顯現社會對於外籍與大陸配偶，以一種「屬民化」的操作模式，將之物化、或者認為他們的存在是對於整體主流社會人口的「惡質化」，這種論調也是從上位者到下位者一種對移民者偏見的社會共構過程。

---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系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如同 Fanon 所言，台灣社會一方面存在著對於歐美文化的「依賴情結」，一方面又迫不及待想要完成接待國的「內部殖民」，對東南亞和大陸移民者充滿著閹割焦慮。論述過程中，缺乏對於身為接待國的角色反省，許多的結論和建議，是基於對移民者的「想像」而來，這其中甚或有些仍不脫西方知識科學的霸權文化。

研究者認為，欲改變這種單一型態的發言，應該進一步辯證台灣做為接待國的角色，允許有別於精英份子的觀點出現，讓外籍與大陸配偶有更多發言的機會，讓東南亞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自己陳述，使主流社會更重視移民女性在社群中的發聲。

關鍵詞：後殖民主義、移民女性、霸權。

Keywords：postcolonialism, female immigrants, hegemony

## 壹、台灣與世界的移民現象

近年來全球化形成的一種趨勢，就是國際通婚與移民的速度越來越頻繁，迫使移入國必須提出種種策略以解決移民現象帶來的社會問題。

全球化人口流動的趨勢主要肇因於全球化經濟活動的效應以及東歐與其他共產國家解體導致的移民潮，移民現象在經濟較為成熟的國家相當普遍，但是這些國家多半仍以高技術性專業人員的「選擇性」移民為政策考量。依據 OECD（2005）公佈的報告書指出，非本國及比例最高的國家分別是盧森堡（Luxembourg）的 36.9%、瑞士（Switzerland）的 20.5%、與奧地利（Austria）的 8.8%，美國的非本國籍者佔人口總數的 6.6%，鄰近國家的日本為 1.0%、韓國為 0.3%；而國外出生者則以盧森堡（32.6%）、澳洲（23.0%）、與瑞士（22.4%）三個國家最多（Dumont & Lemaître, 2005）。

台灣與上述國家的移民性質的差異在於近年來的移民者以婚姻移民居多，台灣民眾與不同國家、文化通婚者越來越多，尤其又以台灣男性娶東南亞女性 and 大陸女性的人數增加非常快速。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1982 年台灣男性與外籍女性結婚者僅有 111 人，且以日韓為主，與外籍男性結婚者僅有 16 人。但至 2002 年台灣的外籍女性移民人數已經達到 17,339 人，是四年前(1998 年)的兩倍，平均每 8.6 對結婚者中有一對為中外聯姻。自 1999 年開始，外籍配偶的人數就以直線上升逐年飆漲，但在女性外籍配偶之中，初期又以印尼女性較多；而後隨著越南和高棉開放，移民女性人數也逐漸後來居上。尤其自 1997 年之後，幾乎外籍配偶之中有七成以上是越南移民女性。

2006 年國人總結婚對數中，配偶為外籍人士(不含大陸港澳人士)者占 6.7%，為大陸港澳人士者占 10.1%，兩者合占 16.8%，較 2005 年下降 3.8 個百分點。如與 2003 年之最高峰 31.9%比較，降幅達 15.1 個百分點。截至 2006 年底止，我國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約達 38.4 萬人，其中外籍配偶(含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占 34.9%，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占 65.1%（內政部統計處，2007）。

在台灣的學術圈有關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的學術論文和研究報告早已不下數百篇，但在如此廣博的論文中，有些是實務工作者從服務過程中提出對現象的探討，也有些從各種量化研究、問卷、訪談方法的資料蒐集中，建構屬於移民社群的特質。研究者自己也從事外籍配偶的相關研究，但研究者認為，在眾多論文報告中，研究人員所持的立場為何？作為一個接待社會的研究人員，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如何看待外籍配偶的議題？研究者跳開數據與現況或問題的描述，試圖從鉅觀的理論中尋找答案，並從檢視後殖民主義理論的過程中，反思研究者的立場與地位、從接待社會一份子的角色，觀照一個夾雜於西方與東南亞(甚或大陸文化)衝擊的台灣社會，如何看待外籍配偶議題，此即構成本文產生的動機。

移民議題的討論在西方社會原本就已存在，早期西方社群的討論，其實是圍繞在「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上辯述，但研究者認為「殖民」二字用以敘述外籍配偶現象仍是有落差的，「移民者」(migrants)至少有選擇的自主性，與「殖民」隱含統治意涵的關係仍有不同。因此本文雖援引後殖民主義理論，但希望探討的是外籍配偶的「移民」現象，而非對外籍配偶的「殖民」。Fanon 從黑人觀點重新詮釋殖民，他們的後殖民論述也一直居於殖民議題探究的核心地位，Spivak 從一個女性的角度，為「無言者」發聲，有別於後殖民主義之前的西方觀點。Spivak 批判學術社群很容易犯了「速泡杯湯症候群」(instant soup syndrome)，認為對於特權的產生和過程可以不假思索，只要直接把熱湯注入就可以得到結果，事實上我們卻忽略了質疑權力如何產生？甚至提出女性主義實踐的問題 (Spivak, 1990)。Spivak 認為，除了「非西方」(non-Western) 之外，應該能夠更明確指出非西方的東西是什麼，因此 Spivak 以「東方主義者」(Orientalist) 自居 (Spivak, 1990)。研究者認為，台灣的移民與外籍配偶現象的討論，應該跳脫非西方觀點的省察與敘述脈絡，甚至從女性的視角，關照女性做為一個移民者以及女性做為家庭中的從屬者，外在的社會價值如何建構移民女性。這些或許有助於避免選擇與西方殖民論述相同的觀點，此為本文選擇後殖民主義論述的理由。

## 貳、後殖民主義的發展與演變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相對於「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一詞的意涵通常是由時間的向度上區隔(李英明，2003)：以二次世界大戰為分界點，二次大戰之前，西方資本主義在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互動模式稱為「殖民主義」或「舊殖民主義」，它的主要表現為以各種名義用武力對其他民族或國家進行領土的、經濟的、或政治的掠奪和擴張(曹莉，2003)，並由殖民國家直接統治，殖民地國家則處於喪失主權的狀態(陶東風，2000)。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對立的冷戰時代開始，原來的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形成所謂的「第三世界」，這些國家雖然擺脫殖民國獨立，但在政治、經濟上還是大量依賴西方世界，此即「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陶東風，2000；Spivak, 1996)。

後殖民主義理論則關注第三世界國家與民族和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文化關係，尤其是西方歐美資本主義對「落後」國家在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知識話語和主體構成的一種帝國主義干涉政策和霸權意識(曹莉，2003)。雖然西方世界揚棄以政治統治的方式行使它在非西方國家的主權，但是卻透過另一種形式的經濟控制或文化行銷，達到控制的目的。就被殖民者而言，雖然在主權上脫離西方國家宗主國，但在政治、經濟、甚或文化層面，都仍處於依賴與「被殖民」的狀態。

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於新殖民主義的批判，主要從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凸顯西方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不對等關係。Frank 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指出，第三世界國家長期的貧困反應的是他們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依賴性」，使得西方國家恣意在第三世界國家剝削經濟剩餘。不過這樣的觀點後期也得到許多抨擊，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崛起，的確也讓依賴理論學者重新修正理論西方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依賴性發展」的關係(Webster 著、陳一筠譯，1990)。

第三世界的去殖民潮流，引發了對殖民者心理狀態的探究，同時科學研究(如



「人種記憶研究」)的出現，讓焦點回歸到檢視殖民社會中殖民者的心態。Octav Mannoni 為此階段的重要學者，他的「殖民心理學」論點包含殖民者的自卑感與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結。Mannoni 將依賴情結引喻成幼兒對父母的依戀與依附關係，因此當依附關係斷裂時，造成父母對自己失能失權的恐懼，導致不自信的自卑。如果 Mannoni 可以被視為殖民者的獨白，那麼 Fanon 就是被殖民者的自我剖析。Fanon 認為自卑感與依賴情結兩者互為一體在被殖民者身上呈現，這種卑下意識的形成，是因為客觀的社會結構與主觀的心理結構兩者相互深化的結果（陳光興，2005）。

Said 撰述《東方主義》一書，闡述西方文化如何從審美、學術、經濟、歷史和哲學等對東文歷史、文化和存在現實進行滲透，透過訊息霸權製造有關東方的假象。東方社會中的崇洋、遵奉歐美學術研究的結果，無形中增強了東方民族成為歐美附屬的信念（Said, 1979）。Said 批判，帝國主義以全球化的方式將各種文化與身份混合，讓我們誤解世界上只有黑與白、東方與西方的分別（Said 著、蔡源林譯，2001）。Fanon 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引用 Alan Burns 爵士的話，指出強大種族對於那些被視為低賤於自己的種族，這種不理智的怨恨來自於膚色。膚色是一個種族最容易被看見的外在記號，因此做為最初的印象和判斷，膚色的明亮或深暗比個人的教育和社會成就容易識別（Fanon 著、陳瑞樺譯，2005）。

## 參、外籍配偶現象的後殖民論述

後殖民主義的論述，從西方的觀點出發，形成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化論述。當探討非西方國家的去殖民化過程時，卻並非如此單純。就歷史的觀點來看，台灣做為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國家、或者在大戰期間與美國關係緊密的聯盟國，在去殖民化的過程，擺脫西方(或者更廣泛地包含日本)的殖民，成為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但是隨著近幾年來的新移民逐漸增加，這樣的論述似乎又更添增其複雜

性。台灣相對於美日，為政治、經濟與文化接受體，但相對於移民者，卻又展現「內部殖民」的霸權文化。

台灣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暫時性與永久性的國際移民，前者如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客工(guest workers)、僱傭、或來自英美語系國家的美語教師，後者如透過通婚移入的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這些複雜的關係，已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二元論述所能精確辯證。探討台灣與移民文化時，「移民文化」本身涵蓋的層次就包含日本統治台灣時期與光復初期的美日文化，與後移民時代的東南亞文化，台灣的定調介於兩者之間，不但必須探討與美日等強勢或主宰文化的關係，同時也必須細微地觀看台灣又是如何看待東南亞的移民文化。實際上研究者也擔心這樣的理論引用，可能也會落入後殖民主義學者的批判，本質上仍不脫歐美西方的意識型態論述迷思，純粹就是將後殖民論述套用到台灣的外籍配偶現象，這在方法論和認識論上是有謬誤的。不過，後殖民批判者也不可諱言地指出，如果抽離文化霸權(hegemony)論調，後殖民理論家建構的理論樣貌又是如何？至少研究者認為，在本文闡述的過程，必須超越殖民與被殖民的論述，才能更細微地去觀照主宰文化對移民文化的控制——所謂「主宰」者，相對於台灣文化，美日文化可能屬於主宰文化；但若從東南亞移民文化來看，台灣文化又成了主宰。

本文的目的希望透過後殖民理論的辯證和論述，解析台灣社群面對外籍與大陸配偶時，公共論述(主要透過立法院公報與媒體的報導)如何形成台灣的移民或者外籍配偶議題，其意義或影響又是如何。以下從四個主要論述主軸敘述，分別是：對移民者偏見的社會共構、自我的內部殖民、語言的學習——臣屬於宗主的「失語」狀態、後殖民論述中的女性主義批判。

## 一、對移民者偏見的社會共構

Fanon 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指出黑人或白人感知的他者，來自於身體形象的差別，所謂的他者，即在身體形象上的有別於我，亦即無法辨識或同化



者 (Fanon, 2005)。Fanon 指出的身體形象其實就是膚色，但研究者則進一步將身體形象解釋為代表個人特質的膚色、說話音調、服裝打扮等外表。研究者認為，東南亞或大陸配偶雖然與台灣人的膚色並無太大差異，但是在說話音調則可以區辨不同。如同前述所言，Fanon 認為被殖民者意識到自己與白人的不同是來自於膚色，透過白人所建構的意識形態，「標示」(marking)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身體差異，白人的優勢權力把黑人化約到膚色的生物層次 (陳光興，2005)，甚至是足以標誌他者的身體符號來對待。對於外籍配偶的認知是「非我」，但是這種非我的認知來自於身體符號，僅知「不同」，但卻很難描述其內涵。也就是許多外籍配偶相關研究所犯的謬誤——不斷比較新移民與本籍的文化、親職能力...的差別，但又無法明確指出外籍配偶的母國文化是什麼、他們的親職教養觀又是如何。

對於移民者的偏見，來自社會整體從上到下的共構，政府官員和媒體同時也扮演形構整體社會對移民者價值觀的打手。例如：

將東南亞與大陸移民女性「物化」，將移民女性化約到只剩下人的基本本能，尤其對於女性，更是刻意突顯其生物本能式的、生殖的一面，認為她們來台灣的動機是為了打工，從事性交易的工作。以下為舉例：

一、據悉，近來有許多以僱用外籍女子坐檯為號召的小吃店，如雨後春筍般地開在台中縣龍井鄉火力發電廠區的附近。因此，每當入夜時分，發電廠四週就呈現出燈紅酒綠、喧嘩不止的怪現象，宛如是外籍女子的賣春特區。

二、大多數的坐檯女子都是落跑的外籍勞工，或是已經拿到工作證的外籍新娘。其中尤以越南籍的比率偏高，這不僅突顯出在外籍勞工的管理教育出現嚴重的漏洞之外；更顯現出我國在鼓勵外籍新娘融入台灣生活宣導工作的失敗。(立法院公報，2005/4/27)

將東南亞與大陸移民女性屬民化，但卻未思考這是整個體制對東南亞與大陸

移民女性的工作權壓制，使得她們即使擁有工作能力也不被社會體制接受。同樣地，來自英美語系國家的美語教師，在台灣卻可擁有迥然不同於東南亞移民者的社會地位，其中是因為移民者身後的英美語系文化血統護身符？還是因為台灣社群對於不同文化的差別待遇？Fanon 提到：「我在自己身上逡巡著客觀的目光，發現我的黑、我的族群特性，穿破鼓膜而來的是一吃人肉、心智發育不良、偶像崇拜、種族缺陷、黑奴販子。」（Fanon, 2005，頁 184）。除了身體形象的偏見，對於移民者或他者，還存有文化的鄙視，如同我們視東南亞國家為「落後國家」。例如將東南亞移民女性標籤化為「帶有愛滋病」的可疑嫌犯。以下為衛生署答覆立法委員質詢的紀錄：

為防止感染愛滋病之外籍新娘入境，本署亦已函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於我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其外籍配偶申請「停留簽證」時，除審核相關證明文件外，並得要求外籍配偶提出最近 3 個月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檢驗報告，以保障我國人民之健康，另本署亦積極透過各種管道進行愛滋病防治宣導，並多次發布新聞，呼籲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前，應確實完成含愛滋病毒檢驗在內之婚前健康檢查，並避免發生不安全性行為，以避免抱憾終身（立法院公報，2005/1/7）。

這種偏見的共構，是一種從上到下的社會集體運動，不僅上位者如此，Fanon 反駁 Mannoni 的說法，直指這種厭惡的態度，連白人無產者也會將其侵略性移置到黑人無產者身上，因為無產階級沒有豪宅、沒有土地，當把猶太人（或在本文為外籍配偶或外籍勞工）視為低下和有害時，才得以顯示自己是精英者（Fanon, 2005）。如同媒體所述，外籍勞工與國人的衝突，經常來自文化的誤解和衝突，以及對外籍勞工佔據就業機會的仇視（中央通訊社，2007）。但是這種仇視也是在上位者的順勢作為，使這種厭惡感符應社會多數人的期待，也讓勞動階級的無能得到合理化的藉口。

## 二、自我的內部殖民

Fanon 曾經提出「批判性的民族主義」概念，用以批判殖民主義之下所產生的民族主義，被發展成極端的文化本質主義或民族本質主義。Fanon 最早描述批判性的民族主義時，主要用以稱述在殖民時代統治結束時，那些反抗殖民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爲民族文化主義者，他們要求回到原來的民族文化或種族文化，宣稱要重新尋回人民的本質與文化的力量，這種操作的力量，使得民族主義保衛者發展成掌握文化霸權與統治霸權的宰制者，Fanon 認爲這是以文化民族主義爲藉口，進行一種新形式的「內在殖民」。如何避免內在殖民的產生？Fanon 認爲，被殖民者獨立之後，必須避免獨裁統治權貴的出現，以防止他們做出更嚴厲的規範以限制移民（Fanon, 2005）。

外籍配偶現象的論述過程中，研究者認爲這是一種「自我的內部殖民」。如前所述，台灣社群在外籍配偶移民潮之前所接觸的移民者或外國人士，以來自美日國家爲主，就長久的歷史淵源來看，台灣的近代史也無法擺脫與這兩個國家的關係。東南亞外籍配偶，一個來自與之前截然不同的文化類型、語言模式、生活習慣、飲食方式的衝擊，使得台灣社群對異文化產生「擔憂」，因此許多對於東南亞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的言說，是充滿 Gramsci 所說的文化霸權思維。透過文化的優勢或「強勢」，迫使非「主流」（Gramsci 稱爲的「非西方」）人們自願臣服於西方的文化宰制之下，使東南亞與大陸移民，成爲相對於台灣社群的一種「屬民」（或「賤民」，subaltern）。因此這種「擔憂」擴散成爲一種社會的普遍思考。例如，以下爲立法院公報中，立法委員對職訓局長的質詢紀錄：

立法委員質詢職訓局郭芳煜局長。

委員：本席認爲你們應善謀對策，不然這個問題一直擴大下去，會產生更大的問題。過去各縣市政府舉辦過外籍新娘語言教育課程，他們

將同區域的同國籍外籍新娘聚在一起上課。

局長：我們有舉辦這樣的訓練。

委員：但這會出現一個問題：因為這些人語言互通，一旦一起上課，不但上課時在台下竊竊私語，降低上課效果之外，還很自然地比起各自的夫家家境來了，小從冰箱，大到汽車，最後造成她們許多夫家拒絕讓她們去參加這樣的課程，因為她們一上完課，回家就吵，產生諸多問題。雖說這項作法立意良善，可以幫助他們融入台灣社會，但你們要注意執行時的技巧，你們可以讓不同村或不同國籍的外籍配偶聚在一起上課，以避免發生上述的問題。我們並不反對越南或其他國家的人成爲一個社群，但這個社群不能成爲他們融入台灣社會或和其夫家相處時的一個障礙。（立法院公報，2006/04/24）

語言的學習是一種最佳的文化宰制工具，政府辦理外籍配偶的各種識字班教學，使他們學習語言，目的是希望她們「融入」台灣社會，而且不能對夫家造成任何障礙。外籍配偶「屬民化」（或賤民化），例如，認為她們是無知的一會比較夫家家境之後吵鬧、產生問題，因此需要「教育」，需要保障夫家（既得利益者）的權益。

將外籍配偶和大陸配偶「屬民化」還有一例，行政院和政府官員對於外籍和大陸移民女性的生育率比其他台灣女性更高，稱之為「人口素質的惡化」，但是這樣的言論或疑慮卻未曾出現在1999年之前的日韓、歐美結婚移民者。

行政院答覆立法委員質詢

我國出生率屢創新低，主計處統計報告94 年嬰兒出生率僅為0.91%；另一方面外籍配偶及外籍勞工大量移入我國，內政統計通報94 年結婚對數中配偶為外籍人士及大陸港澳人士者占20.1%、勞委會統計外籍勞工在台人數達327,311 人。種種跡象皆反映台灣人口素質正在惡化中。（立

法院公報，2006/3/27)

Fanon 在〈黑人與精神病理學〉一章中，將白人對黑人的恐懼，解釋為白人對其他人種的「無所不在」--他們在銀行、股市、政府部門工作，所表現出來對於其他人種的恐懼感，擔心未來國家可能淪落在他們手中，因此他們誇大黑人的「性能力」，將他們描述成性慾的動物，簡直跟生殖器沒兩樣，孩子多得數不完，因此白人必須注意他們的下一代將我們淹沒了（Fanon, 2005）。Fanon 這段話巧妙地說明了內部殖民菁英對於外籍配偶的閹割焦慮，因此言述的過程中，不斷強調她們如何會生小孩，實際上外籍配偶子女人數的增加，主要導因於台灣女性不願意生，因此外籍配偶子女的數量相對較多，實際上外籍配偶平均生育子女數與台灣女性並無太大差異。

這種以台灣社群為主體，強迫社群內的民眾與外來移民者必須認同的「內部殖民」，使得許多言說的本質不斷地捍衛父權主義，並使得東南亞與大陸移民女性臣屬於殖民者文化。Gramsci 認為，在市民社會中，觀念或權力對於移民者的宰制並非來自於暴力的強加介入，而是透過社群中普遍存在的「共識」（consent）產生作用，Gramsci 將這種文化領導的形式稱為「文化霸權」（hegemony）（陶東風，2000）。透過政策與公共論述，不斷使得這樣的言論取得「正當性」--為了保障國民健康、為了人口素質、為了使移民女性快速融入社會、避免造成夫家困擾，達到社會共識的背書。

### 三、語言的學習—臣屬於宗主的「失語」狀態

Spivak 從女性主義的批判角度解析女性與屬民(subaltern)的發語關係，她指出，這是一種宗主與臣屬的二元化分野，使得臣屬在這種分野狀態下變得「失語」，或者必須透過宗主的語言才能「發語」（李英明，2003）。從性別發展的軌跡，女性被隔絕於參與反抗殖民，往往因為女性的沒有聲音，讓女性的從屬性更



是被積壓於底層，自然而然在整個殖民史的研究中，也會被消音（Spivak 著、張君玖譯，2006）。女性使用非自願性的語言，被迫整併到宗主的圈子內，因此從屬者在表達與論述的過程，被迫要符合宗主的語言框架，無法以自己母國的或自己願意的聲音來發言，必須透過宗主認可的語言與形式才能發言。例如，外籍配偶在考機車駕照的過程中，所有測驗的題目均是以中文寫成，外籍配偶不僅要懂得機車考照的內容，而且這還是一種變相的「中文測驗」，考照的目的在了解考照人是否了解交通號誌與規則，但是對無法使用中文的外籍配偶，理解中文的困難度卻比考照內容更高。透過這種考試機制，外籍配偶必須被迫學習中文，機車考照無法以外籍配偶了解的越南文、印尼文考試，在霸權的優勢作用/主導下，各個種族或階級的差異性消隱了，只表現出霸權可以接受的模式和型態。

葉郁菁(2004)探討歐美國家、東南亞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的適應，結果發現東南亞外籍配偶在家跟子女使用的語言卻多半以國語或台灣話為主（78%），會使用雙語的外籍配偶只佔 21%。大陸配偶因語言相同，所以高達九成以上的大陸配偶與自己子女在家使用的語言為國語。有 55%的歐美國家外籍配偶在家與子女是雙語的溝通模式。歐美或其他國家的配偶在家庭中有較多機會可以與子女講自己國家的母語，但東南亞外籍配偶期待子女為雙語使用者但與實際的落差最大，至於他們在家無法使用自己國家母語的原因為何，是否為家人排斥或外籍配偶「入境隨俗」學國語和子女溝通，從國外對移民配偶的研究指出，跨國婚姻者面臨的適應問題為以有限的知識和語言在主流社會（host society）中生活，語言往往成為限制參與主流社會的阻擾因素（Hearst, 1985）。歐美國家外籍配偶家庭中認同雙語的重要性大於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突顯的是在這些家庭中他們得天獨厚擁有一位以英語為母語的家長在雙語發展上的優勢。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中，將近六成台灣男性（或太太）希望自己配偶與子女在家只講國語，反應在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中，台灣文化（或台灣語言）相對於東南亞文化（或越語、印尼話、泰語）仍屬優勢。Bourdieu 指出，語言論述、說話方式、以及各種語言運用的策略，在現代社會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並且社群中的人的說話、談論，是一種社會



力量的展現，跟誰說話、說什麼話、用什麼方式說話、在什麼場合說話，都是一種社會力量競爭的結果（高宣揚，2002）。因此，我們可以從「不標準」的國語，敘說的內容、使用的辭彙等，去區辨言說者從何而來，她或他的背景是否為外籍配偶，是哪一國的外籍配偶。

Spivak 所指的「失語」狀態，不僅反應在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家庭中，甚至超過一半的歐美外籍配偶家庭中使用「美語」作為主要的語言溝通模式，忽略他們生活在以中文為主的環境之中，這種弔詭反應的也是一種以歐美語系為宗主的霸權優勢。這種關係已非 Spivak 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語言關係所能稱述，中文相對於東南亞語言作為一種宗主，但同時又是一種相對於歐美語系的臣屬。如同陳芳明（2005）所述，透過語言使得被殖民者敲開自己的心扉，讓新的語言、記憶、文化、人格進駐他們的體內，並且使得被殖民者依照殖民者意欲塑造的被殖民者的形象自我型塑。

#### 四、後殖民論述中的女性主義批判

Spivak 在後殖民的論述中，還有另一個重要貢獻，她把後殖民主義的論述與女性主義結合，抨擊後殖民主義跳脫性別意識型態的不合理，並指出父權中心觀/男性中心觀的論述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或者在本文要探討的外籍配偶婦女，反而是一種雙重的壓迫。Spivak 指出，在階級意識的討論中，似乎不會把女性議題或反性別歧視牽扯進來，但是當我們忽略這些問題的時候，等於我們已經向男性中心主義的激進份子靠攏，他們長久以來將民族主義等同於人民，但卻忽略人民與女人還是有所區隔（Spivak, 2006）。研究者認為，這種壓迫不僅因為語言上的弱勢，而且外籍配偶結婚到台灣來的過程，也是充滿「交易、買賣」類同商品化的言說，商品化的婚姻價值觀，以傳宗接代、照顧家庭及取得工作權為目的（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在外籍配偶家庭中，男性主義或父權主義的思想更甚一般家庭。例如，潘淑滿(2004)指出，會選擇與東南亞女性通婚的男

性，可能由於居住邊緣地帶，或由於職業、身心障礙、年齡等因素限制，居於社會不利地位，取不到老婆，因此才會透過仲介公司，從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國家，購買新娘。外籍配偶丈夫及其家人的心態，把外籍新娘當成「商品」(commodities)，而不是人來對待(潘淑滿，2003)。外籍配偶在這些社會不利的家庭中，無異是弱勢中的弱勢。因為女性在家庭中的照顧角色，或者成為經濟依賴者，女性被迫與家庭中的弱勢者—小孩、老人綑綁在一起，她的地位被矮化、附屬於男性之下，在外籍配偶家庭中更是如此。Spivak 以印度教「寡婦殉葬」(sati) 描述在殖民社會中女性的臣屬性，當女人無私無我的奉獻於家庭之中，才能彰顯其存有 (to be)，因此這種奉獻犧牲的殉葬，充其量不過是為了彰顯男性的英雄主義與丈夫代表的「徹底他性」(radical alterity) (Spivak, 2006)。

後殖民主義強調種族的政治、非西方國家對抗西方中心時衍生的民族主義，但是卻忽略反殖民之後的民族主義，同樣也是充滿對女性的嚴重歧視。後殖民批判者認為，西方女性主義所指的「第三世界婦女」，其實是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陶東風，2000)。西方女性主義透過強調西方女性與「他者」--第三世界的婦女的差異性，呈現西方女性主義優越於第三世界婦女的隱喻，西方女性主義以「解放」第三世界婦女為已任時，也把第三世界婦女矮化為西方世界的次等公民。

西方女性主義者把第三世界婦女再現為貧苦的、沒有受過教育的、束縛在傳統中的、以家庭為中心的，藉以突顯自己富有的、有教育的、現代的、自我決定的特質。這樣的理論推移，研究者用以解釋台灣配偶對於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偏見。從 790 位女性偏見量表的調查中(葉郁菁，2006)，台灣女性傾向認為外籍與大陸配偶居住在鄉下、他們的居住處很髒亂、衛生不好、認為外籍與大陸配偶不老實、不聰明，問卷的分析中呈現台灣女性擔憂外籍與大陸配偶家庭及其子女的未來發展，例如，有 33% 的台灣女性認為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的問題是來自母親，但僅有 17% 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同意此說法。在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4) 提出的移民因應方案中也指出，大陸與外籍配偶家庭應該重視的教育問題包含，跨國及兩岸婚姻多以社經地位較差、年紀較大、或身心障礙等弱勢者為對象，因此可

能造成第二代學習發展過程容易有適應困難或受排擠的情形，形成弱勢循環，加上部分子女因為退縮對社會產生排斥，容易造成少年犯罪率增加等。這種劃分「我族」與「他者」--外來移民，藉以突顯自己相對於外籍與大陸配偶(尤其是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優勢，則是類似西方霸權主義或父權主義的自我中心觀點與思維。尤其在許多研究報告提出應該如何對外籍配偶家庭做建議，這樣的論述是從外籍配偶本身出發，還是純粹從一個第三世界菁英的觀點提出？

第三世界的精英是用什麼樣的語言挑戰像歌利亞一樣的大巨人(Spivak 所指的是歐美文化)、還是沿襲著歐洲對他者文化所建構出來的科學，成為西方意識的傳聲筒(Spivak 著、張君玫譯，2006)。Spivak 的論述無疑提醒所有外籍配偶研究學者，在採述西方理論過程中，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與先見洞察台灣外籍配偶現象的特殊性，還是仍把西方科學的知識套在外籍配偶現象的詮釋。史學家對於屬民言說的詮釋，是經過轉化的、或者將屬民的語言透過學術、理論的黑箱子，重新製作出來的新產品。Spivak 一方面幸運地擁有印度血統，讓她能在後殖民的議題上超越西方知識份子的框架，同時她在西方學術界的活躍，又使得她的論點得以曝光(Spivak, 1990)。研究者放在外籍配偶的議題上思考，也就是說學術圈對於外籍配偶的「分析」、「解釋」，學者替外籍配偶、大陸配偶說話，但外籍或大陸配偶仍舊無法自己言語。在這樣的社群中，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透過什麼樣的管道顯現自己的聲音？或者，我們聽到的言論，其實只是學者或媒體（足以有權力掌握發聲權的人）對於外籍配偶現象的片面詮釋。

研究者對於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臣屬」的議題，還有不同的看法。Gramsci 所說的文化霸權宰制，除了透過語言的訓練讓外籍與大陸配偶「臣屬」於霸權，另一個宰制的方式即透過經濟的掌控，使得外籍配偶和大陸配偶的經濟權被剝奪，因而臣屬於父權之下。

對東南亞新移民女性來說，拿到外僑居留證後 15 天即可工作。且依據【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雇主聘僱「設有戶籍之國民」的外籍配偶，得不受工作種類、工作展延次數、轉換雇主或工作等等的限制。然而，一方面因業主

並未充分獲得相關訊息怕雇用非法外勞而拒絕，一方面不諳中文或台灣工作的相關法令、沒有身分證或普遍的社會歧視亦使得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在找工作時，常發生被拒絕或薪資待遇不公的現象。在大陸新移民女性方面，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及第十七條之一，大陸配偶到達依親居留期間，符合工作許可條件後，得向主管機關(勞委會)申請許可受僱在台灣地區工作，才能因為特殊身分取得工作權。因此，許多大陸女性常因家計負擔而背負假結婚真打工的污名，而更因此加重社會歧視。此外，大陸新移民女性和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同樣遭受到學歷認證的問題。台灣因為長期脫離國際社會以及與東南亞國家缺乏學歷相互認證機制，許多東南亞女性的學歷不被承認或有承認上的困難。而大陸女性則是因兩岸特殊的政治關係，目前學歷認證只在高中職以下之學歷。缺乏學歷認證的問題使得新移民女性即便有工作權，但在找工作的時候往往只能屈就於非正式的、缺乏保障、流動率高的工作（王君琳，2006）。女性在社會中的收入與職業長期以來存在「玻璃天花板」的效應，對移民女性而言，她們又是弱勢者中的弱勢，不僅收入和職業受到「女性」身分的限制，同時也因為政府種種對於移民者的規定，使她們的工作空間更受到壓迫。

2004 年台灣各部門的女性受雇者，其每月平均薪資為 36,854 元，尚不及男性（48,255 元）的 76%，且女性受雇者仍明顯集中於中低階層、助理性、服務性之工作及傳統中被認定符合女性的特質的職業（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06）。女性原本在台灣社會中就是經濟和就業的弱勢者，對於東南亞和大陸移民女性，他們能夠獲得的經濟保障更是困難，且由於政策上對東南亞和大陸移民女性工作資格的限制、以及學歷採證問題<sup>1</sup>，使得她們的工作條件根本無法與其他一般的台灣女性相抗衡，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提出的「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就業協助方案」（2005）即指出，台灣的大陸與外籍配偶約有 30 萬人，其中大陸配偶 19 萬人，實際居住在台者有 13 萬人；外籍配偶約有 11 萬人，實際居住

<sup>1</sup> 有關大陸人事學歷採證與檢覈，主要依據教育部 1997 年公佈的「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第七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在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後畢（肄）業於經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所取得之學歷，其申請檢覈，應檢具的文件第三款為國民身份證影本，亦即大陸來台人士未取得國民身份證之前，大陸的學歷是不受採認的。

在台者有 8 萬 4430 人，大陸配偶實際已就業者有 23,294 人，外籍配偶實際就業者有 28,496 人。大陸配偶實際就業佔目前居住在台者為 17.9%，外籍配偶實際就業的比例則有 33.8%，明顯高於大陸配偶，但兩者均比台灣女性 2006 年的就業率 48.68%（東森新聞報，2007）低出甚多。透過政策的壓縮，使得她們受限於家庭照顧工作，即便可以就業的三分之一的外籍配偶或五分之一不到的大陸配偶，都可能因為他們無法取得學歷認證的資格，不論在薪資或職業都次於台灣女性，成為真正的「屬民」。

## 肆、結論

本文從後殖民主義理論探討台灣的外籍配偶現象，並從對移民者偏見的社會共構、自我的內部殖民、語言的學習—臣屬於宗主的「失語」狀態、後殖民論述中的女性主義批判四個主題進行論述。

隨著從東南亞與中國因婚姻移入台灣的人數（尤其是女性）增多，開始出現許多對於外籍與大陸配偶的論述。研究者認為，殖民地國家為了揚棄被殖民者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控制，衍生出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但是其結果也使得為了強化內部的社會整合而發展出獨尊主流社會文化的「內部殖民」的論調，因此充分顯現在外籍與大陸配偶的論述過程，就是一種將之「屬民化」的操作模式，將之物化、或者認為他們的存在是對於整體主流社會人口的「惡質化」，因此從媒體或官僚體系的公共論述，不斷出現對於這群移民的「憂慮」，這種論調也是從上位者到下位者一種對移民者偏見的社會共構過程。勞動階級必須醜化、負面化移民者，才得以將自己的無能合理化，而上位者只是順勢作為，讓這樣的觀點成為社會普遍價值，以符合勞動者的期待。

當後殖民主義者以屬民化描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時，研究者認為較難以西方、白人或「東方、黑人」的二元對立交代台灣過去歷史中被殖民與現代扮



演接待國的雙重關係。如同 Fanon 所言，台灣社會一方面存在著對於歐美文化的「依賴情結」，因此社會價值觀仍舊對於歐美外籍人士有比較高的位階與尊敬。但同時，台灣居於一個接待國的角色，又迫不及待想要完成「內部殖民」，對東南亞和大陸配偶或外籍勞工充滿著閹割焦慮，擔憂他們的移民將使得台灣的人口素質變差，忽略外籍配偶或外籍勞工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甚至是人口帶來的正面影響。因此在論述過程中，缺乏對於身為接待國的角色反省，許多的結論和建議，是基於對移民者的「想像」而來，這其中甚或有些仍不脫西方知識科學的霸權文化。在論述的過程中，我們也需要 Spivak 的女性主義批判，社會價值觀強調外籍配偶需要「融入」台灣社會，需要生活適應，她們的語言能力需要提升，她們是需要「教導」的。外籍配偶移民女性被低等化到只有女性的本能--「生殖」和照顧家庭，忽略外籍配偶發聲的主體性。研究者認為，欲改變這種單一型態的發言，應該進一步辯證台灣做為接待國的角色，允許有別於精英份子的觀點出現，讓外籍與大陸配偶有更多發言的機會，讓東南亞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自己陳述自己的需求、連結自己的關係與資源，使主流社會更重視移民者，甚至身為一個女性在社群中的發聲。

## 引用書目

### 中文部份

中央通訊社，《勞委會宣導廣告 呼籲民眾同理心對待外勞》，2007 年 7 月 7 日。

網址：<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707/5/gx42.html>。檢索日期：

2007 年 7 月 8 日。

內政部統計處，《2006 年第三週內政統計通報(2005 年國人結婚之外籍與大陸配



偶人數統計》。網址：<http://www.moi.gov.tw/stat/>。檢索日期：2006 年 6 月 4 日。

內政部統計處，《九十六年第二週內政統計通報(95 年國人結婚之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統計)》，2007 年 1 月 12 日。網址：

[http://www.moi.gov.tw/stat/main\\_1.asp?id=2584](http://www.moi.gov.tw/stat/main_1.asp?id=2584)。檢索日期：2007 年 4 月 5 日。

王君琳，《從台灣移民政策與法律看新移民女性的經濟處境》。台灣婦女展業協會，網址：

<http://www.twdc.org.tw/xoops2/modules/sections/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32>。檢索日期：2006 年 8 月 14 日。

立法院公報，《立法院第 6 屆第 3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2006 年 4 月 24 日。網址：

[http://lci.ly.gov.tw/doc/communique/final/word/95/22/LCIDP\\_952201\\_00015.doc](http://lci.ly.gov.tw/doc/communique/final/word/95/22/LCIDP_952201_00015.doc)。檢索日期：2006 年 8 月 1 日。

立法院公報，《質詢事項。94(20)，299-384》，2005 年 4 月 27 日。網址：

[http://lci.ly.gov.tw/doc/communique/final/word/94/20/LCIDP\\_942001\\_00006.doc](http://lci.ly.gov.tw/doc/communique/final/word/94/20/LCIDP_942001_00006.doc)。檢索日期：2006 年 8 月 1 日。

立法院公報，《質詢事項。94(5)，155-213》，2005 年 1 月 7 日。網址：

[http://lci.ly.gov.tw/doc/communique/final/word/94/05/LCIDP\\_940501\\_00019.doc](http://lci.ly.gov.tw/doc/communique/final/word/94/05/LCIDP_940501_00019.doc)。檢索日期：2006 年 8 月 1 日。

立法院公報，《質詢事項。95(10)，193-278》，2006 年 3 月 27 日。網址：

[http://lci.ly.gov.tw/doc/communique/final/word/95/10/LCIDP\\_951001\\_00005.doc](http://lci.ly.gov.tw/doc/communique/final/word/95/10/LCIDP_951001_00005.doc)。檢索日期：2006 年 8 月 1 日。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階段外籍與大陸配偶移入因應方案》，2004 年 6 月 16 日。網址：<http://www.ris.gov.tw/ch9/f9b.html>。檢索日期：2006 年 8 月 1 日。

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台北：生智，2003）。

東森新聞報，《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就業多媽媽」誓師》，2007年2月2日。

網址：<http://news.yam.com/ettoday/society/200702/20070202903750.html>。檢

索日期：2007年4月23日。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就業協助方案》，2005年3月

16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修正發布。網址：

<http://www.sef.org.tw/html/rule/rule1-5-34.htm>。檢索日期：2006年4月23日。

高宣揚，《布爾迪厄》（台北：生智，2002）。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性別與就業經濟」圖像整理及國際比較報告書(草稿版)摘要》。網址：

[http://www.womenweb.org.tw/MainWeb/discuss/Discuss\\_Show.asp?Discuss\\_ID=55](http://www.womenweb.org.tw/MainWeb/discuss/Discuss_Show.asp?Discuss_ID=55)。檢索日期：2006年8月1日。

曹莉，《史碧娃克》（台北：生智，2003）。

陳光興，〈法農在後/殖民論述中的位置〉，輯於 F. Fanon 著、陳瑞華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5），39-59。

陳芳明，〈膚色可以漂白嗎？〉，輯於 F. Fanon 著、陳瑞華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5），12-18。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

葉郁菁，〈台灣與外籍（東南亞與大陸）女性配偶對於種族偏見的看法——以嘉義縣為例〉，輯於鄭博真、陳建廷主編，《幼兒保育專業發展——理論與實務》，（台北：華騰，2006），163-198。

葉郁菁，〈國際婚姻家庭的新文化適應——東南亞、大陸與歐美外籍配偶家庭的比較：以台南市為例〉，《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7（2004），85-102。

潘淑滿，〈從婚姻移民現象剖析公民權的實踐與限制〉，《社區發展季刊》105（2004），30-43。

潘淑滿，〈通往彼岸的紅地毯：新移民婦女、公民權和婚姻暴力〉，台灣女性學學會、清華大學性別與社會研究室與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共同主辦，《「意

識、認同、實踐—2003 年女性主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清華大學，2003)，1-37。

## 譯著部分

Fanon, F. 原著、陳瑞華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5)。

Said, E.W. 原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2001)。

Spivak, G. C. 原著、張君玖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台北：群學，2006)。原著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1999.

Webster, A. 原著、陳一筠譯，《發展社會學》，(台北：桂冠，1990)。

## 外文部分

Dumont, J. & Lemaître, G, (2005). *Counting Immigrants and Expatriates in OECD Countries : A New Perspective*. Paris: OECD.

Erikson, F. (1995) Culture in society and in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Banks, J.A. & McGee-Banks, C.A. (Ed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Boston: Allyn & Bacon.

Hearst, S. (1985). Turkish families. In D. Storer (Ed.), *Ethnic Family Values in Australia*. Sydney: Prentice Hall.

Kamali, M. (2000).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clientization of immigrants: the Swedish case.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11 (2), 179-193.

Said, E.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pivak, G. C. (1990).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Harah Harasym (Ed.). London: Routledge.

Spivak, G.C. (1996). *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D. Landry & MacLean G. (Ed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